

亲历

1960年代儋县木棠中学学生生活琐记

开学报名注册 离奇交牛屎

文\余良师

一九六〇年代“文革”期间,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我就读的儋县北部地区一所小有名气的中学——木棠中学也不例外,学校办农场,建水库,造梯田,种水稻、种甘蔗、育红萍,还有其它农作物。平时,我们除了学一点学校自编的所谓教材《政文》《数理》、《农化》之外,这些“合编教材”没有多少知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到学校农场参加劳动。

小小年纪的我,为了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常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找借口向班主任请假,诸如说肚子痛呀、感冒呀、父母病呀、姑姑阿姨结婚呀等等理由。其实,也不都是请假,因为班主任有时不批准。怎么办?一个字“逃”。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我们好几个同学旷劳动课竟达到100多节。

由于土地贫瘠,化肥又短缺,我们种的水稻、甘蔗、花生等产量都很低。于是,学校作出了一条现在看来十分“离奇古怪”的决定:每位学生开学报名注册时,先交160斤牛屎。这一下可麻烦了,因为我家离学校有5公里远,交通不便,父母又忙于农活,我不可能从家里挑那么多牛屎到学校。我们几个同学只好结伴到学校附近村庄的田间地头、山坡荒野找牛屎,连续找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算完成了任务。

有了牛屎作肥料,我们的庄稼真的增产了不少,学校放鞭炮热烈庆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深享受到劳动的收获和快乐。(亲历栏目欢迎来稿)

知青兄弟张建军 长眠吊罗山水间

文/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



张建军(前排左一)牺牲前与知青合影。 苏晓杰 翻拍

10月25日,当年参加吊罗山开发建设的180名知青从北京、广东等地汇聚到吊罗山,开始了回访之旅。180名知青每人手捧一支黄玫瑰,来到因公牺牲的知青张建军墓地悼念。吊罗山林业局局长谢明东,讲述了当年的知青张建军英勇的故事。

谢明东还记得,“1976年2月23日,张建军同往常一样,早晨5点钟起床。上班的钟声一响,建军放下没吃完的面饼,和战友们一同上山放伐。”

当天下午两点多钟,张建军和两个伙伴在用拖拉机拉一棵锯倒后挂在榕树上的大树,试了几次拉不动。当时伙伴们建议,放弃吧。建军执意不肯。“当时张建军觉得,这棵树有两立方方,拉不出去,烂在山里国家财产就受损失了。”

于是,建军爬上2米高榕树树杈,背靠树杈,用油锯锯掉碍事的树杈。此时不幸的事发生了。由于树倒后的压力压断了树杈,倒下的树从榕树上滑落下来,上下树杈象剪刀一样,将建军夹在中间。建军大叫“油锯,油锯”,便昏迷过去。在场的伙伴奋力撬开夹着建军的树杈,救下建军抱在怀里,呼喊着建军醒醒。此时,建军已停止了呼吸,一位不满20岁的知青就永远地留在了吊罗山里。

建军牺牲后,吊罗山林业局党委追认张建军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号召全局职工学习张建军奋斗精神,继续抓革命,促生产。

1950年代末 60年代初定安龙门中学学生生活杂忆

入学报名 须交茅片10块

文\莫清华

友人寄来母校龙门中学校园的照片,看后无限感慨:旧貌变新颜!那三层楼的教学大楼和校舍,那平顶式的教室,水泥硬化的校道,四个标准化的排、篮球场以及那丰富多彩的植物园。整个校园绿树成荫,花草相映成趣。好一个新农村校园!

我是1959年从龙门高级小学考取龙门中学的。它创建于1948年,当时叫定南中学。1949年春招收第一届学生。抗战胜利后,定安县国民政府就筹划人才培养问题。设在龙门镇的定南中学负责招收黄竹、岭口、石壁、文曲、龙塘等乡镇的学子。

搭寮高手

我收到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单很有意思,其中两个主题词:自带床板,学费7元。而老生入学报名,床板不再交,但每人要交10块茅片。

茅片,也叫茅草片,是盖茅寮(茅屋)用的“瓦”,用7支小竹片夹(也有高手用5支竹片的)着茅草头编成的,1米多长。从初一下学期起,这是每人必交的“作业”。

当时我们的教室与男生宿舍是一幢茅寮,墙,是用稻草和着泥挂在扎好的横杆上抹光而成。一道泥墙就把宿舍与教室隔开。不设门的,那时没人偷东西。床打成长长的统铺,每人床头一个小木箱盛衣物。这教室、宿舍连通了,很方便。记得冬天,衣服单薄的同学上课时冷得发抖,老师就叫我们过宿舍去取毯子来披着上课御寒。那毯子都是棉毯,没有毛毯,买不起,有棉被的同学没几个。

那个时候,开学第一周的“功课”是盖茅寮,茅寮用了一个学期就得翻新,茅片要换,泥墙都重新糊。可以说,当时龙门中学的毕业生,从搭屋架,到盖茅草片,到糊泥墙,不论男女,个个都是高手。

龙门坡当时荒地不少,茅草遍地,园界处茅草、竹子不少,10块茅片的任务不成问题的。到初二时,就不用父母操劳,我们都能自己准备好去报名入学。

到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龙门坡一度大种甘蔗,学生的劳动课占去大半天时间。那时候的入学报名是规定每人必需交600斤牛粪,吓得一些学生因牛粪拾不到这个量而不敢来报名。这是后话。

藏龙卧虎

龙门地属红壤土,我们叫“赤土坡”。下起雨来,地面十分滑。我们这些学生,几乎人人都滑倒过。水井与食堂地处南边低处,要下几道坎(斜坡),这“坎”成了“事故高发地段”,尽管学校将“坎”用锄头挖成台阶状,仍有人滑倒。

当时这个乡镇中学属广东省,来自广州、汕头等地的大学毕业的老师也常常滑倒,有时连饭都撒了。饭是每人一份,撒了,就只好饿肚子了。

龙门中学当时可谓藏龙卧虎。有当过副县长的语文老师张亮,有抗战时期到过中亚、东南亚各国的英语老师杨英汉等五六人,他们都是因被打成“右派”而“发配”到此的。他们上课水平很高,生动易懂。那时候,我们每周有两个半天(有时甚至三个半天)是劳动课,但各门文化课程都能赶完。

当时的校园到处是草。校园里经常看到一个老人牵牛的身影,他,50多岁,背有点驼,穿着黑色的衣服,脚着用废轮胎做的凉鞋。牛吃草,他看书。他可是个“人物”:1926年参加革命,“四·一二”后赴上海从事地下斗争,抗战时期赴延安,后受命回广东抗日。曾在大学任教。解放初期,出任定安人民政府副县长。不知什么原因成了“右派”,在此带罪教书,所以要放牛。他知识渊博,我古文不懂的都喜欢去问他,他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答。

那时没有自来水,水井在坡下田边,很大,四方形,约100平方米。这并不光学校用,镇上的居民也来此挑水吃。井边有两排只有墙无顶棚的露天洗澡房,男一排,女一排。男同学,包括男老师,大都穿着一条裤衩,就在井头用铁桶打水冲凉。那男洗澡房只作换裤子的地方。女同学则提一小桶水到洗澡房里抹了事。我们小男生因穿着裤衩冲凉,开始不懂得冲净下身的肥皂水就换裤,不少人阴囊“蚀酥”(皮肤发炎)又痛又痒,甚是痛苦。后经老师指点,才避免了这皮肉之苦。

开头两年没有电灯,一个教室一个用煤油为燃料的汽灯。晚上自修都靠它。点汽灯要打气,那个力气活,收火还要有技术,要把握火候,灯纱才收得圆,灯光才白亮。这活都是班长他们几个大师兄包揽了。

生产自救

1960年,全国进入饥饿年代。不少同学只带蕃薯来当饭,食堂统一蒸饭,他们饭钵里就只有几条蕃薯。国家为保障我们学生有饭吃,改为供应商品粮,好像是免费。每人每月大米26市斤。到后来,连大米供应也不足,要搭配蕃薯干片。因此,各班下了最后一节课就要派人去抬饭来分。

每班一箩筐糠(干饭)。由班长分。那时我们班里同学年龄差距有七八岁,几任班长都是大个头的担任。开始分饭,班长也没有经验,分到最后一时才发现不够分了,只好均着,紧后每人所得的份量只有前面的一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如还有剩,班长也不与后面的人私分,而是让前面的同学也来分一点。这26斤粮食只够中晚两餐。当时师生都不吃早餐。做完早操就早读、上课了。学校管饭,但菜是各人自带。多是菜头脯(萝卜干)、酸菜,我娘有一次给我的是一小冬菜坛子田蟹酱,那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酱料。开始,一打开,大家嫌臭,但用箸头沾来一尝,竟大叫好吃,不两天就被大家分享光了。我只好与同学共用他们的菜头脯,那时,每个学期有7—10天甚至半月的“农忙假”。

每逢“农忙假”,学校就组织我们下村帮助生产队割稻。虽然这是很累活,但可以放肚皮吃糯。我们都乐意去的。

为了让学生吃饱肚子,当时公社(当时龙门镇叫“龙门人民公社”)拨一些水田和学校附近的一些坡地给学校耕种,学校划给每班一块。我们的劳动课就是种地了。我们种了可快速收获的蕃薯、蔬菜,填饱了我们的肚子。

在我们的蕃薯还没收获时,我们常常中午到公社那些收罢的蕃薯地、木薯地、南椰地里拾小“薯落”,拿回来用小土锅煮了吃。

那时虽然贫困,没有学生有盗窃行为。学校附近就是公社蕃薯地,没有一个学生偷挖蕃薯充饥。大家都有一个观念——“公家财产要爱护,私人财物不能偷”。

海南改革开放 30周年

讲述



《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

黄一鸣:

镜头记录开放的海南

文/海南日报记者 许春媚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进了第三十个年头,海南,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日报》海南记者站站长黄一鸣,对这种变化感受至深。

改革春风拂海南

阳光透过百叶窗帘的缝隙斜射到屋内,微眯着眼睛,黄一鸣回想起记忆中的1978年。

黄一鸣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以前,他已经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氛围。当时,由于被下放到边远黎寨的父母,重新回到了陵水防疫站工作,曾经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他也回到了城里,参加高考,考上了广东交通学校就读。



烂尾楼中的健身者 黄一鸣 摄

“这让我看到了阳光,感觉到了新希望。”

1981年,在陵水卫生部门负责宣传工作的黄一鸣被单位派到广东省台山卫校学习美术、写作、摄影等。一接触到摄影,从新奇到深爱,黄一鸣再也没舍得放下相机。经常在海南日报上发照片,他成了海南日报的老通讯员。对身边人和事物的观察,比别人多带了一种新闻的眼光。

黄一鸣清楚地记得,他曾被海口的一家罐头厂邀请去为他们生产的椰子设计拍摄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来以后社会反响相当不错。这样的事物在以前都是没法想象的,改革的春风就这样轻轻柔柔地吹到了海南。

“礼仪小姐”成抢手货

“海南发展最重大的转折点是建省,建省的消息传来,这个海岛的变化可以用飞速来形容。”黄一鸣说。

1987年,海南建省前夕,中国日报社准备在海南省建记者站,四处物色合适的人才。那时的黄一鸣由于懂开车,又会拍照片写稿子,正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于是黄一鸣被调入记者站,从一名“国家干部”

变成了记者。这个身份让他更加方便地用照片记录了许多海南的重大变化。

在黄一鸣摄影作品中,记者看到一张有点“乱”的黑白照片,一堵灰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招聘启事,而站在墙前面的,也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建省初期号称‘十万人过海峡’”黄一鸣说。海口的街道上突然间全是人,而且说的话是南腔北调。那时东湖边的一堵墙上,贴满各种招聘和求职信息,闯海人都要到这里来看看,那面墙后来被称为“闯海墙”。

建省后大面积的城市建设也随之开始了。那时天天都有项目开工,黄一鸣说,有时候我骑着摩托车,一天得赶十几场的开工典礼。因为开工工程多,“礼仪小姐”成了抢手

货,“我甚至拍到一个礼仪小姐因为赶场太多,累得趴在姐妹怀里哭泣的照片。”

“烂尾楼”改头换面

1990年代初,房地产投资过热,泡沫经济给海南留下了很多“烂尾楼”。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思考,黄一鸣决定把“烂尾楼”这个题材用摄影手段进行深入的报道。第一组图片和文稿很快在《中国日报》上发表了。随后,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专题的摄影报道。他笑着说,为了拍摄这些照片,我是“伤痕累累”,在拍摄的过程中,脚上穿的军用皮鞋多次被铁钉刺穿,几次还险些掉进没安装好的电梯口。

这个专题完成之后汇编成了《黑白海南》画册,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配合海南省处置“半拉子”工程项目的启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在,我书里一大部分半拉子已经找不到了,它们要么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了商场、写字楼或住宅,要么已被拆掉了。”黄一鸣说,“看到去除了疤痕越变越美丽的城市,心里真开心。”